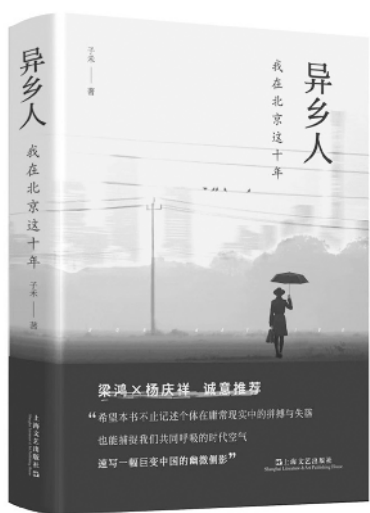


异乡人的爱与哀愁

夏丽柠



朋友送了我一本于禾的新书《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我知道朋友送书都会背。我在北京快二十年了，在北京，我也是个异乡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的诗句，几乎每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都会背。我在北京快二十年了，在家乡与异乡之间，我像个局外人。故乡的城市飞速变化，早已不是我离家时的模样。而北京，自打我来

的那一天，也许就从未跟上过这个超大城市日新月异的脚步。

《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这本书，我读得很懂，我知道于禾在说什么。他以冷静、准确的笔触写下了他所了解的漂泊生活，写下了异乡人如何用青春供养这座城市，写下了异乡人在异乡永远都在寻找合适的位置，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角落。

最令我惊喜的是，作者并未将本书写成“口述实录”那种“伤痕文学”，而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通过细致的观察描摹这座城市里的平凡生命。文本通过让异乡人与本地人在工作现场、居住场所等各种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对位，凸显了生命中的光明与黑暗，漂泊中的爱与哀愁。

我知道一个词：漂浪，用来形容我们这些离家远行的年轻人，比漂泊更恰当。年轻时，我们心中都有大理想，想去远方，想看不一样的世界。因此，我们的远行里，都有“浪”的成分，没有“泊”，因为不知道在哪里会停下来。流浪啊，那是一件多么时髦的事情。我们是听着三毛的《橄榄树》长大的一代，恰逢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弄潮儿啊，那是一个多么

闪亮的称谓，说明我们做着一种先进的行为。耳畔响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的歌声，就去买了一张不知抵达哪里的火车票。

就像于禾开篇写的那位大哥，本来想去广州，因为没有票了，北京还有，就来了北京，开始了“制作成衣”的事业。虽然事业不成，却少不了男女爱情的感情纠葛。人在异乡，可只要有爹娘在，家就还在故乡。这也是大哥婚事不利的因素之一。他与广里交到的女朋友，分别被各自故乡的原生家庭撕扯，人不能分两半，只能彼此分开。这是大哥年轻时“漂浪”的挫折，也是永远无法回头的人生。青春的爱情，总是那么生动，以至于多年后回看，还是那么痛。

爱尔兰作家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也是写这样一个故事。小镇姑娘艾丽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布鲁克林，白天在百货公司上班，晚上去夜大学习，甚至还陷入了一场恋情。当她以为要展开新生活时，家乡来了消息，让她回去。人生的十字路口，艾丽斯必须做出选择。我特别喜欢托宾这本书的宣传语：“漂泊他乡，就会在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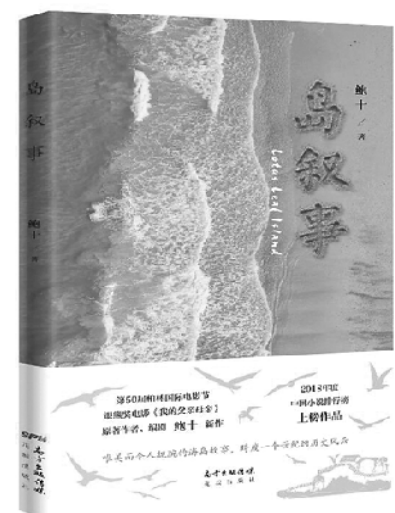
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是的，于禾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无论是《小裁缝》《孤岛生活》《六郎庄一年》《三义庙的回声》，还是《沙河记忆》，同样写出了这种感觉。在他乡，不只是为事业与爱情拼搏，而是那种孤独，会让每个人都有将要溺水而亡的感觉。

全书里，最打动我的是第二部分的开篇《一个悲伤的故事》，篇幅很短，写的老白、M和于禾三个同乡短暂的交往。文本里的M，一闪即逝，他考取了北京的公务员，却适应不了工作，总想辞职不干了。你看，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抓住新生活，那些扑面而来的，别人以为的幸福，对本人来说也许是桎梏。北京，是人尖子扎堆的地方，机会多，赚钱多，这是老白对北京的评价。他说得对，但你不是那个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就很难说了。当我读到这篇“永别”的小标题时，我哭了，M就是那个痛失机会的人。

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很难说少年离家是对是错。作为巨变中国中的一粒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拼搏，永远都不会错，即便有失落，也要感谢生活。

对小说有信仰的人

刘莱琳



我喜欢能提供新鲜体验的小说，虽然故事总有母体，审美却永远都有开疆拓土的可能。鲍十的小说就是这样，总能拓宽阅读视野，新鲜情感体验，他不甘心只给读者提供甜腻奶茶或速溶咖啡，而是初尝涩、回味甘的好茶，又或者人口顺滑、后劲十足的好酒，这才是鲍十小说的味道。

读他最近的中篇小说《我是扮演者》，开篇就被抓住了。一场梦中预告的自杀：一份预先投送的演员手记，通过演员孟千夫记录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串联起差不多一部五花八门的国史”，经由这部手记，历史上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丑事奇事“碎片式”地轮番呈现，如万花筒般呈现民族史。所以小说《我是扮演者》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狂人日记》，孟千夫的演员手记是他自己的病中日记，也是写作者的狂人日记。同时又因其明星手记的界定具备了极强的“私人史”性质，从中窥探出一个演员的成长、骄傲、困惑以及最后走向绝望的过程。小说从写作者的叙述到孟千夫的自述，从孟千夫记录自己扮演的角色到不断剖析角色的内心，又经由

“编者赘言”回到创作者……层层深入，又回环嵌套，从实入虚，又由虚返实，建构了一个多声部且互为回声的精巧结构。所谓孟千夫，其实就是“梦千夫”，创作者、叙述者、记录者、扮演者……诸多身份，数种感情，掩卷之时，不免感叹人生如梦。

鲍十的小说一直有很强的艺术追求，前两年的中篇《岛叙事》也是其中代表。一座海岛、一个老人，几处历史转折，数番风雨阴晴。海岛虽小但故事背景宏大，不动声色间数十年风云；笔调虽平静却如深广大海暗藏汹涌。小说如其名，叙事如海岛，张力惊人、后劲十足，由岛与海奠定了故事的基调与情感，提供的是一种如海浪如海岛如海风如海潮一般的书写模式及阅读经验。《我是扮演者》《岛叙事》，以及多年以前的《纪念》都具备民族史的意义，这些文本以极丰富的内蕴塑造着民族的共同记忆。优秀的小说作品往往能将难者鲜活的、个人化的记忆转化为大众文化中可重复再生产的共同记忆，这是记忆的复制，这也是小说的生产。

除了生活经验的拓宽，民族记忆的书写，鲍十还有一种身为小说家的自觉：他力求不断提供新的叙事方式。他的小说文字总是很平和，人物总是很朴素，却总能感受到作者与人物、人物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有一种流动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阅读产生新的意义，通过“理解”他人深刻自己，通过“共情”他人丰富自己。

康德说“启蒙”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那么小说创作的探索应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真正的作家会运用自己的理智，以真正的良心与理性去看待每一个人；他们会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语言的力量；坚守自己的良心，牢牢把握手中的笔；与生活纠缠、与现实斗争、与人心对话。能写出《狂人日记》一般的文本，我相信鲍十就是一位对文字对小说有信仰的人。

一部微观社会的警世通言——读《逃往天堂的孩子》

余喜华



曾听一大厨朋友说起一个赌博的故事。他的同村远房堂侄，输得连村里的房子也没有了，靠蹭吃蹭喝，到处借钱过日子。当然，被大厨堂侄借过钱的亲友友人，是不会指望他还钱的，因此他能借到钱的概率越来越小，然后就网贷、信用卡套现，被催得急，坑蒙拐骗手段都用上，拆东墙补西墙。

大厨当过兵，退伍后当过村干部，曾想挽救堂侄，因此为他付出不少，借过钱给他，收留他给他饭吃。但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赌徒越走越远。

大厨说，堂侄的父亲、他的堂哥也是赌徒，堂嫂为此与堂哥离婚，远走江苏。堂侄第一个老婆也因此离婚，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堂侄又结婚生下一个儿子，今年刚刚一岁。女人见其夫赌博成性，吃了上顿没下顿，带着儿子跑回四川老家，堂侄又跑去四川夺回儿子，要自己抚养小孩。

听了这个故事，心想大厨的堂侄继续这样堕落下去也就罢了，这个一岁的小孩跟着赌徒，其今后的人

活，本来是个不错的营生，但他是个嗜赌如命的人，有钱必去赌，逢赌必输，老婆自然没法跟他过下去，跟着别人跑了。没了妈的冯城生，被送回老家村子安置。冯田富在村里倒有一间房子，却是全村最破烂的，连门也关不牢。

送儿子回村后，冯田富返回城里，继续他的赌徒人生，任由儿子自生自灭。上学年纪的冯城生，没人管束，逃学，与唯一同病相怜的玩伴冯冬暖整日在村里游荡。饿了，到村口堂姑的小店领取定量的食物充饥，每日都吃不饱。受尽村人白眼、欺凌的冯城生、冯冬暖向往着去往“有得吃，有得穿，还不会让人欺负的理想之地——天堂”。他们的想法被同村的年轻人冯梦发获知，冯梦发与在城里合租的小李子合谋，以带他们去“天堂”的名义将两人卖掉。在选择买主时，冯梦发“良心尚存”，让小李子选择出价低的两户没儿子的人家，不要选择出价高的煤矿。

故事的最后，冯城生、冯冬暖跟着小李子坐上了去往“天堂”的火车，可是，途中发生了脱轨事故，

造成36名乘客死亡，其中就有这两个孩子和小李子。小说结尾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天堂的话，相信他们一定已在那里了。”

小说故事和大厨所讲的，多么相似啊！作者卢江良先生说，小说中的主角取自于他老家村里的一位远房亲戚。如此看来，类似的赌徒故事，绝不止这么一二例，一定还有因赌而家庭破碎、妻离子散的人伦悲剧，催生像冯城生这样梦想着逃往“天堂”的孩子。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看了这部小说，我觉得这话倒过来更准确，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根源都是一样的。黄赌毒，是毒害人们的三大毒药，是造成千万个家庭不幸的源头。

《逃往天堂的孩子》发表于2012年，是一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小说从微观的视角揭示了赌博这一社会毒瘤，对家庭、对孩子、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为人们提出警示，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典型批评的生命力

段超

“八公山”文艺评论 (第八季) 征文

《诗意的追寻》是文艺理论家李衍柱先生在90周岁之际出版的一部人生路标集，选编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随笔、学术自述与访谈、代表性论著的序言或后记以及来自同行专家的评价文章等，立体地呈现出作者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文艺理论家，李衍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倡导“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他围绕典型范畴展开的理论和批评实践，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典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李衍柱学术研究的原点。1961—1964年，李衍柱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在美学专家蔡仪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典型问题》。典型范畴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对于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其时代背景则是文艺界在“双百方针”（1956年）指导下对于“文学是写人还是写现实”这一问题的反思，认为要把“人”放在文艺创作的中心，强调人是反映现实的手段，更是目的。这一观点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1957年）一文中得到集中阐述。典型研究正是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在蔡先生的影响下，我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为自己掘了一口井，直到它能打出水来。我体会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

法。”（《诗意的追寻》，第104页）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范畴的学术专著。该书不但考证了典型学说在马克思以前的萌芽和脉络、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而且回应了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对典型范畴的挑战，为文艺创作和批评提供了理论支撑。

典型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批评最高标准“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的一把钥匙。如果说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蕴含着一定时代和民族的全息图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世界文学史中的典型群像则“生动地显示出了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历史过程”。（《诗意的追寻》，第129页）典型人物不是“庸俗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而应体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活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然而，受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核心的典型理论一度被边缘化。李衍柱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诸流派代表作家、理论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说，得出了典型依然有生命力的结论：“典型和典型化范畴，不是一个不变的、封闭的模式。典型批评是优秀文艺作品的试金石，也是驳斥各种‘文学（理论）终结论’的武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优秀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新的典型形象，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和田晓霞等，



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中，的确打破了19世纪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的模式，但是它并没有否定自身，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并以新的形态和新的表现方式呈现于世界文坛。”（李衍柱：《文学典型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乔伊斯和马尔克斯等现代文学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典型的内容，甚至后现代主义先驱尼采也坚持典型的观点：“当我寻求对于莎士比亚的最高公式时，我找到的始终是：他塑造了凯撒这个典型。”（尼采：《看哪，这人》，周国平译，见《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9页）

典型批评是优秀文艺作品的试金石，也是驳斥各种“文学（理论）终结论”的武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优秀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新的典型形象，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和田晓霞等，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等，《活着》中的福贵、《应物兄》中的应物兄以及《三体》系列中的史强和章北海等。莫言说：“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之地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莫言，张英：《我期盼下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访谈录》，《青年作家》2018年第1期）李衍柱认为，莫言《蛙》中的姑姑万心是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新人典型：“作品最大的艺术成就，是生动地塑造出了一个肩负着‘人的生产’重任的万心（姑姑）‘这一个’妇婴医生的典型形象。”（李衍柱：《中国诗学的春天》，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4页）

在李先生看来，新世纪以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超级技术的兴起“并未动摇文学作为适应人类审美需要的诗意的存在这一最基本的事实”（李衍柱：《中国诗学的春天》，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只有与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同步互动向前发展，才能不断找到自己的新的生长点。”（《诗意的追寻》，第180页）历史和文学都远未终结，典型批评亦始终保持生命力。

典型研究与李衍柱后来的《文学理想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文艺学范畴论》和《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等著作，整理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范畴体系。有学者指出，典型学说的成功本土化缘自现代中国文艺的“内需”（王一川：《“典型”在现代中国的百年旅行——外来理论本土化的范例》，《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诗意的追寻》也是理论与现实、个人与时代双向选择的缩影。

新书速递

《山音》

川端康成 著

川端康成的魔力之暮年恐惧篇，收录晚年名作《山音》，以垂暮老朽对生命凋零的恐惧，承载川端天命之年的生死忧患，尽述人生之黯淡、疲惫与缺憾。肉体衰老的迹象、糟糠之妻的老丑之态、昔日友人的离世讯息、挥之不去的战争创伤，皆如山音般吹响死亡号角；而年轻儿媳的动人身姿、少年慈童面具的圣洁面影、野性生长的金盃与百合、屋顶盘踞的飞鸢，又透出对重生与生命力的向往。



《起初·竹书》

王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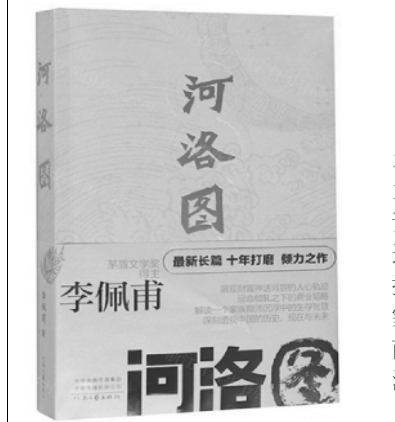
王朔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这两本史书为基础，讲述了从五帝时代到西周共和年间为止的种种故事。从尧舜禅让，到后羿放太甲，到成康之治，从穆王西巡，到周召共和，王朔以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为极尽简省的古史史书赋予了生命力。让后羿、伯靡、周公、穆王、李耳等众多只存在于典籍甚或神话之中的人物活色生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王朔以《穆天子传》中“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八字为灵感创作的穆天子西巡部分，以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史诗式旅程，呈现了通达天地的豪迈视野以及千里同风的雄伟大魄。



《河洛图》

李佩甫 著

《河洛图》以河南巩义康百万家族人物为原型，描写了在河洛文化孕育下，以康秀才、周亭兰、康梅文为中心的三代人，由“耕读人家”走向“中原财神”的创业史。作家通过对康家“留余”古训、“仁信”传家的故事描写，生动刻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忠于国家、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恩怨情仇面前宽容待人的一代豫商的形象，以及惠及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人在非洲》

贾志红 著

《人在非洲》是一部“一带一路”主题作品，作者作为项目建设的亲历者，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审视非洲这块神奇的土地，并付诸情真意切的叙写，绘制出“一带一路”倡议之下非洲人民丰富生动的画卷。她以双脚丈量大地，并敞开自我直面真实的世界，呈现“在场”写作的魅力。

